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相结合:百年思想演进

李 宁

**【摘 要】**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着重要的历史基础、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二者相结合有着极其重要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相似之基和相异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从民本论到人民主体论;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从传统文化的革命话语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从知行合一观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从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到辩证唯物主义。在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演进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发展的过程,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思想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李宁(1977-),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苏南京 211100)。

**【原文出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2021.6.14~22

**【基金项目】**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南京开展‘四史’教育的路径研究”(21ZX04)成果之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和基础。近代以来,各种思想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围绕着“救亡图存”,志士仁人尝试运用外来先进思想解决中国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关系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恩格斯曾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sup>①</sup>,“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sup>②</sup>。这些经典表述非常鲜明地指出了“新”与“旧”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了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结合各国的实际、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再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发展的问题。

当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但又超越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把握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丰富内容。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真理的制高点和道义的制高点,把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民利益的追求作为价值旨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使得它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指导价值。而中华文化同样具有博大的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它包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闪耀着恒久的思想光芒,“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sup>⑧</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反映在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实质,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着相似之基,又有着相异之处。系统梳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基础、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尤为重要。

###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不管是在国外学者的译介作品中还是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那里,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紧密联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二者的相似和相异突出地体现为下述五个方面,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一)从“民本”论到人民主体论

讲仁爱、重民本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顺民意”一直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有着阶级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述评》里,曾深刻

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观,并且把它和当代社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sup>⑨</sup>马克思主义充分认识到的“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并进一步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作用,“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sup>⑩</sup>,从而使民、君主和国家三者的关系发生了扭转性变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强调人民对于国家和社会历史的重要性,但实质性差别又显而易见。党的创建人之一李大钊一接触马克思主义,人民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就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李大钊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功绩,即让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sup>⑪</sup>。“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依然充满信心地写下:“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sup>⑫</sup>革命时期,正是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领导人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依靠人民的力量。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sup>⑬</sup>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思想指导下将“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论升华为“群众路线”,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真正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论到人民主体论的飞跃。

#### (二)从“天下大同”到共产主义

中国一直是有着崇高理想和梦想的民族。老庄思想中带有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推崇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墨家描绘的理想社会也带有共产主

义的特点;《礼记·礼运》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周游列国,也是为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大同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追求的美好社会。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sup>⑧</sup>,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写的《大同书》是一部改良主义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孙中山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sup>⑨</sup>。中国传统中潜在的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文化基因是点燃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星火”,中国在近现代走向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更有“历史”的基因。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对大同理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找到了正确的实践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推动人类文明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⑩</sup>。马克思主义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并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历史使命,第一次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初,李大钊就提出:“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者。”<sup>⑪</sup>“调和”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李大钊的这一表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和马克思主义对全人类命运关注完美结合的思想。

(三)从传统文化的革命话语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儒家看来,“革命”的意义在于革故鼎新,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来自上天,也就是来自人民的意愿和统治者的仁德,如果没有顺乎天、应乎人,就会有人出来揭竿而起、替天行

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革命话语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也提出了极为大胆的“革命”言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sup>⑫</sup>。历史学家范文澜曾从墨家思想的角度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革命”行为,即后世农民反抗,“很有当初墨家思想的痕迹。统治阶级能扑灭墨家,但是农民工人依时代发展的革命力量,却永远不能扑灭”<sup>⑬</sup>,这意味着自古以来的“革命”思想从未熄灭。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曾发生过多次以农民为主体的起义或者革命,但由于阶级的局限都未能真正实现社会制度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形态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就是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在旧的社会制度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严重桎梏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就要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⑭</sup>。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并逐步从思想上到实践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推动这样的一场新式革命,必须对中国的农民以及以往的农民革命进行准确地评估。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运动和革命进行了理性剖析,对中国传统的革命话语进行了科学评判:“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后主义、乡土主义”,“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sup>⑮</sup>。“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的支部”,“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可以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sup>⑯</sup>。通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

究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中国传统的革命话语的认识不论是从思想本身还是到实际行动都真正实现了科学理性的批判,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学理基础。

#### (四)从知行合一观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对知行关系的认识,这与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相通之处。儒家思想对知行问题尤为关注,荀子提出“知之不若行之”,朱熹提出“知先行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知与行相互促进,在道德实践中要且知且行。“知”和“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到了近代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努力在求“知”中探寻救亡图存之路,孙中山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知难行易、知行合一、因知以进行”,号召民众冲破传统的认识禁锢,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思想准备。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它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共产主义运动是实践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的本质属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⑧</sup>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具有惊人的相通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思想,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深刻阐明了为什么必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sup>⑨</sup>。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

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sup>⑩</sup>,才使革命局势转危为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可以说,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是一直贯穿在党的百年历程中。

#### (五)从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到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五行”说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原初状态,老子把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认为“道生万物”,荀子阐述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东汉思想家王充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根等。辩证法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中国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资源,如阴与阳、动与静、理与气、道与器、知与行,《易经·系辞上》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尚书·洪范》提出的五行相克相生,特别是老子提到的“反者道之动”等诸多辩证思想,中国古代传承的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着共同的旨趣。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过程中,把辩证法置于首位,提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⑪</sup>。早期的共产党人从庄子的相对论中阐发了绝对与相对、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发现了“宇宙有二相”“有无之说,亦至无定矣”<sup>⑫</sup>,发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sup>⑬</sup>。正是依据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毛泽东进一步批判了教条主义错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辩证法,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唯物辩证法的胜利”<sup>⑭</sup>。李约瑟更是直接总结了传统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关联:“现代中国知

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sup>⑤</sup>。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重要根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思想要素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近代以来国人开始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直接原因在于西方用炮火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华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被迫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到了“现代性的重锤撞击”<sup>⑥</sup>。而现代性的观念在中国农业社会几乎很少产生过,世界文明的进程推动着中国社会必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虽然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但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实际情况。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最为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但不是宗教教条,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必须创造性地重构新的文化系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根基,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绽放新的时代生命力的指针。

## 二、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呈现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sup>⑦</sup>在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宣

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程度进行社会动员,逐步改造农民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让更多的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保持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

五四时期,李大钊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化并没有全盘否定,也没有全盘否定孔子,他们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形象。李大钊1920年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尽可能多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竭力把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代经济因素及西方观念融合起来”,“透过世界革命的新棱镜和马克思主义世界主义价值观,他看到了另一个传统中国的形象”<sup>⑧</sup>。五四时期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有些片面,但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建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也在探寻如何将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揭露国民政府强调的“以礼义廉耻之提倡为复兴民族之武器”与“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企图“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sup>⑨</sup>,另一方面,号召全党在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还要研究历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同时还要使马克思主义“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已“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sup>⑩</sup>。张闻天量吸收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优秀思想,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共产党人的问题,论述了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要能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要能“以身作则”,体贴群众,“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sup>⑪</sup>。刘少奇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修身的意义和修养方法的基本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建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要求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建立了

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学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毛泽东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⑧</sup>所谓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结合后呈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中国共产党总结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sup>⑨</sup>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方面均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sup>⑩</sup>;二者的结合还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价值观,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现代社会价值指向。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体现在文化方面就是要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sup>⑪</sup>。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文化保障。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科学文化现代化”思想的提出和初步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充满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sup>⑫</sup>中国新政府的责任是“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sup>⑬</sup>。在1956年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sup>⑭</sup>。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

化。周恩来也不止一次提出挖掘古代文化的精华要为今天社会主义服务,他认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周恩来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勤劳、勇敢和优秀的,它们创造的文化都有自己民族的特色:“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sup>⑮</sup>1957年,周恩来在杭州群众大会讲话时说:“‘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完全应该的,孔家店是要打倒的。可是现在对孔子就应该全面评价,对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就应该给予肯定。”<sup>⑯</sup>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论述不仅阐明了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而且指出要全面、准确地发掘,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

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党的领导人们思考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并提,1959年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再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方面的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60年1月4日,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和现代化国防。显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检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则是实现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出现了对历史文化遗产问题采取粗暴态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实行全盘否定的现象,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形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来自党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造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脱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段时期,虽然经历波折,但是党明确提出了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这一新的时代

主题,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指引,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塑造出“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系列精神成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改革创新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改革创新思想,这些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也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sup>④</sup>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科学认识论,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思想方法。1979年10月,邓小平明确表示重新恢复百花齐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政策。他用《礼记》中的“小康”一词来阐释“中国式的现代化”,凸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以鲜明的中国风格。邓小平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阐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结合开辟了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江泽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sup>⑤</sup>,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sup>⑥</sup>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并进一步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命题。胡锦涛分析了我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指出它们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

现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我们党“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sup>⑦</sup>。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胡锦涛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任务,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做出了重大论断,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政治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通的时代性创造。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sup>⑧</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突出优势,具有深厚的文化内在力和强大的传承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sup>⑨</sup>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集中体现为下述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智慧。“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sup>⑩</sup>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真正认识到“尚贤者,政之本也”,为培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他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sup>⑧</sup>。同时，习近平也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文化的升华，作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sup>⑨</sup>。第三，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理念体现了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篇章”<sup>⑩</sup>。

###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地位和未来走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以往中国革命史进行辩证分析的结论，是百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不竭动力和宝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是“修齐治平”的家国意识，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忧患意识，无论是“一寸丹心图报国”的献身热忱，还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sup>⑪</sup>，都在新的时代洪流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汇聚成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吸引着无数的仁人志士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和实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吸取、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少任何一个要素，中国都不可能真正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大历史任务，唯有二者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7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用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文明在百年党史中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今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任务，并随着新的时代要求不断酝酿出新的时代课题。整体来说，大体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和方向：

面向历史和理论，继续进行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是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sup>⑫</sup>。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续进行深入地探究，应该是我们永不停歇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和相通之处到底有多少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多少思想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要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了多少思想因素，等等，都需要我们继续挖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这些问题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理论问题，虽然我们曾经研究过，但

这是一个“未竟”的任务,需要继续深入探究。

面向中国的现实生活,凸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不仅仅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主力军,在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升华”<sup>⑧</sup>。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二者达到真正融通,归根到底要立足于21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百年前,李大钊就告诫我们:“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sup>⑨</sup>。一百年以后,习总书记同样告诫我们:“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sup>⑩</sup>。解决好民族性问题,才能有更强的能力解决世界性问题。

面向世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的背景下,未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在形式上一定是包容开放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sup>⑪</sup>当然,未来中国文化发展在内容上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比如,“现代的话语体系、哲学思维方式、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大众文化”<sup>⑫</sup>等等,不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哪个视角都需要我们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在凸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基础上,为开展国际交流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努力

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2页。

③许全兴:《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光明日报》2021年5月18日第16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209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⑧《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1版。

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印书》(上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9页。

⑩《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6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⑫《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⑬《孟子·梁惠王下》。

⑭《范文澜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413页。

⑯《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133页。

⑰《李大钊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136页。

⑲《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96—297页。

⑳《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㉒《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

㉔姜义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旗文稿》2021年第12期。

㉕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1、63—67页。

㉖张庆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刍议》,《广西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5页。

㉘张小平:《李大钊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

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5页。

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㉛《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

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㉝曹应旺:《“三大法宝”的中华文化渊源》,《北京日报》2019年1月14日第15版。

㉞张岩磊、高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支撑》,《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7日第13版。

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㊱《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㊲《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

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㊴《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3页。

㊵《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㊷《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㊸《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页、229页。

㊹《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1—282页。

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㊻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㊼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㊽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02月26日第1版。

㊾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1版。

㊿丁俊萍、林建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启示》,《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①张岩磊、高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支撑》,《光明日报》2016年4月27日第13版。

②钱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学习时报》2018年1月24日第4版。

③田鹏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理论学刊》2015年第11期。

④《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第14页。

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1版。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9页。

⑦杨金海:《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